

原住民族的社會資本與幸福感[#]

黃源協、莊俐昕*

一、前言

國家治理的最終目標乃在於「追求快樂幸福」，國民幸福(national happiness)已被視為是一個負責任之前瞻且現代化政府所應重視的目標，其重要性已不亞於國民所得和經濟成長率。英國前首相卡麥隆(David Cameron)即強調，全民幸福快樂乃是「新時代政府」治理價值之一，他堅信一個國家進步的象徵，不僅在追求經濟的成長，亦應考量其他多元議題，例如家庭關係、友誼、社區、價值、環境、工作成就、幸福感等面向。

事實上，追求快樂幸福已逐漸成為國際社會施政的目標，且測量幸福感的指標亦不斷出籠，其中，最著名的莫過於不丹(Bhutan)的「國民幸福總額指標」(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Index, GNH Index)。另外，英國政府於2010年公布「國家福祉指數」(National Well-being Indicators)，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亦於2011年5月公布「美好生活指數」(Better Life Index)和「OECD幸福指標手冊」。或許受到這股國際情勢的影響，前總統馬英九先生於2012年2月初宣布，自2013年起將年年公布「國民幸福指數」。審視國際上對於幸福的測量指標，其所涵蓋的範圍皆已遠遠超越經濟層次，尤其是社會關係亦被納為關鍵指標之一。

在各個國家，原住民族往往不但在人口比例屬於「少數」，且在生命、教育、就業、經濟及社會關係的機會，亦處於相對「劣勢」。臺灣亦不例外，例如在經濟面向上，以2014年為例，原住民的個人月平均所得為27,378元，低於全體國民的37,433元(原住民族委員會，2015a)；家庭年平均所得為

[#] 本文為科技部補助之整合型計畫「遠離悲情·邁向幸福——原住民族觀點」之子計畫「原住民族社會資本與幸福感關聯性之研究」(計畫主持人：黃源協、協同研究人員：莊俐昕)的部分研究結果之整理。

* 黃源協，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特聘教授；莊俐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原鄉發展跨領域學士學位學程(原住民專班)助理教授。



658,117 元，僅約為全體國民 (1,1071,427 元) 的六成；另外，2013 年，原住民的低收入戶約為 7.30%，遠高於全體國民的 1.79% (原住民族委員會，2015b)。

或許因原住民族的各種劣勢處境，在社會政策或社會工作相關議題的研究，絕大多數對於原住民族議題的研究，往往偏向其劣勢或不利情境的問題導向 (鄭麗珍、李明政，2010；黃源協，2014)，儘管問題導向的研究有其價值，但卻可能深化社會對原住民劣勢的烙印，甚至不知不覺地建構出原住民似乎很不快樂或很悲情的感覺 (孫大川，2000)，嚴重的甚至造成對原住民的偏見或歧視。然而，原住民族處於相對劣勢或不利情境是不爭的事實，但原住民族真的那麼不快樂或悲情嗎？

當多數對於原住民族的研究焦點仍偏重於問題或需求取向時，若能夠從各個不同的面向，正視原住民族的「幸福」(happiness)、「優勢」(strengths)、「充權」(empowerment) 或「能力」(capacity) 等議題的探討，將有助於以更多元的取向了解原住民族社群，或許可藉此讓社會以正向的態度看待其優勢與能力，進而降低對原住民族的誤解、偏見或歧視。本研究選擇非物質層次的社會資本 (social capital)，作為探究其對原住民族幸福感的影響，希冀能開啟對於原住民族幸福感議題的關注，更重要的是期待能為原住民族的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找出另類的研究或介入途徑或觀點。

二、文獻檢閱

「人在情境中」是社會工作專業領域的慣用語，任何影響個人的幸福感絕不能自外於其所處的環境。Thin (2012:3) 在其「社會幸福感」(social happiness) 一書即提及，支持全球熱衷於追求幸福政策的三個核心理念為：幸福是所期待的 (happiness is what counts)、幸福是該被期待的 (happiness should be counted)，以及幸福是可被提升的 (happiness can be improved)。Thin (2012:4) 亦指出，幸福是社會的 (happiness is social)，它是源自於良好的社會關係、對某種文化的適應及公平的制度。就此而言，社會關係實為影響個人幸福諸多因素之一，而這種社會關係某種程度上即是當代頗受各領域關注的社會資本。為此，社會資本與幸福感即為本研究的兩個主要核心概念。

(一) 社會資本

社會資本並不是一個單一的概念，它可能因個人身分及其互動網絡而有

不同的層次，Gittell & Vidal (1998:15) 依人與人及人與團體之間關係的緊密度，將社會資本區分為「結合型社會資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 與「橋接型社會資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這種區分方式與 Granovetter (1973) 所提之社會網絡的「強連結」(strong ties) 與「弱連結」(weak ties) 有相似之處。晚近，不同層級的個體、社區或公共組織或團體之間的關係亦受到關注，有學者即將這些超越階層或社區層次的關係歸為「連結型社會資本」(linking social capital) (Halpern, 2005)。

因而，若將社會關係視為是一種連續體，從「強連結」到「弱連結」一般可將社會資本區分為三種類型 (Woolcock, 2001; Kearns, 2003 : 43; Johnston & Percy-Smith, 2003; Newman & Dale, 2005; Middleton et al., 2005; Talbot & Walker, 2007 : 482) :

1. 結合型社會資本：係基於一種獨特的認同且同質性成員彼此間之多面向的關係，成員有緊密的接觸，且具有強烈的相互承諾，例如：家人、親友或鄰居。Putnam 將這種連結視為一種「我群」(like-me) 的連結。
2. 橋接型社會資本：主要係指由異質性的個人之間所形成之較弱、較疏遠及橫斷面的社會連結，例如：同儕、工作上的同事或社區內之公民組織或宗教團體。Putnam 將這種連結視為一種「非我群」(unlike me) 的連結。
3. 連結型社會資本：指的人們或組織跨越既有的界限、地位的連結，是一種垂直的連結，特別是指社區成員和直接或間接影響社區之個體、社區、市場或公共組織之間的連結，它促使人們或團體跨越既有的疆界，透過與不同層級的個人、組織或團體的連結來獲取資源。

(二) 幸福感

Well-being 常與 happiness 被視為是同義詞，但兩者是有區別的 (Seligman, 2011)。在國內，well-being 常被翻譯成「福祉」或「幸福」，happiness 則較常被翻譯成「幸福」或「快樂」，為免於該名詞用於中文產生的模糊或疑義，本研究將 well-being 譯為「福祉」，將 happiness 譯為「幸福」。

「福祉」與「幸福」皆與正向心理學 (positive psychology) 有關。福祉往往被區分為「主觀福祉」(subjective well-being) 與「客觀福祉」(objective well-being)，而「主觀福祉」與「幸福」往往被視為是同義詞，聯合國的「世界幸福報告書」(World Happiness Report) 即指出，「主觀福祉」用於涵蓋一系列個人心情和生活評估之自我報告的籠統措辭，「幸福」乙詞亦經常以同樣籠統的方



式被使用。然而，若使用「幸福」可協助我們聚焦於想法，並比使用「主觀福祉」較快且較易於引人注意 (Helliwell, Layard & Sachs, 2012:11)。

基本上，幸福感具有主觀性與自我評估的特性，必須是超越生活滿足感且對生活是有意義的。為記憶上的考量，Thin (2012) 提供一個簡單的 AEIOU 模式，該模式提醒我們有關幸福的對話係有關：未來的**期待** (Anticipation of future)、目前的**經驗** (Experience in the present moment) 或**結果**的反思 (reflection on Outcomes)，他們也可能是有關迴避或處理**不愉快** (Unpleasantness)，以及有時候也強調解釋——認知的評估 (Interpretation—cognitive evaluations)，對意義的反思或生命故事的發展。哲學家們將「快樂論」(hedonic approaches) 視為短暫的喜悅 (momentary pleasures)，將幸福論 (eudaimonic approaches) 視為是透過對我們整體生活之評估的詮釋。Thin (2012:35) 進一步從迴避或處理不愉快的經驗，提出第三種詮釋觀點——情感恐懼論 (pathophobic approach)，亦即，間接藉由減少不愉快的方式來獲得美好的生活。或許，對 Thin 而言，幸福不僅是「趨吉」，還包括「避凶」。

(三) 社會資本與幸福感

社會資本與幸福感之間存在著某種關係，早期有關幸福感的活動理論 (Activity theory) 即認為，個人的幸福感來自於參與社會生活，例如，Durkheim (1951) 認為在一個整合度高的社會中，個人的社會參與可保護個人免於病態，從社會整合的角度來看，參加各種有意義的、健康的活動，既為個人生活提供了結構，滿足個人結伴、休閒等心理需求，也經由社會成員的分享，彼此提供不同的社會支持，而促進了精神健康、心理適應和幸福感 (Thoits, 1982; 陸洛, 1998)。這種活動理論的論述，其強調生活經驗的分享、社會支持、社會整合皆涉及到社會資本的組成要素。顯見，社會資本的強弱對幸福感可能存在著一定程度的影響力。

三、研究設計與方法

本研究採量化方法進行，主要研究工具為「遠離悲情·邁向幸福——原住民觀點」之「原住民族社會資本與幸福感調查訪問表」。社會資本測量工具係修正自黃源協 (2007) 所編製之「臺灣家庭社會資本調查」之間卷，幸福感的測量工具係由研究團隊參考不丹 (Bhutan) 的「國民幸福總額指標」、「國家福祉指數」、OECD 的「美好生活指數」(Better Life Index) 和「OECD 幸福指

標手冊」及相關文獻進行研發而成，編修過程經歷五個嚴謹的操作階段，並融入原住民的觀點。除個人及家庭基本變項外，社會資本量表包括三個面向：結合型（22 題）、橋接型（21 題）與連結型（25 題），每類型皆含有信任、網絡與規範三項要素。幸福感量表包括心理福祉（16 題）、身心健康（11 題）、工作與生活平衡（16 題）、生活水準（9 題）、人身安全（11 題）及良善治理（36 題）等六大面向。兩份量表皆有相當高的信、效度。

本研究之問卷調查訪問對象為年滿 20 歲以上原住民，透過全臺灣 5 區 55 個家庭服務中心為中間平臺，每一中心約邀訪 15 位符合要件之研究對象參與。訪問係由面訪員至每一家庭中心進行個別或集體施測，合計收回之有效問卷為 790 份，回收率為 95.76%。

四、主要研究發現

統計分析顯示，原住民的社會資本與幸福感有諸多顯著的關聯性。到底原住民族的社會資本與幸福感之間有何關係？底下將分別從結合型社會資本、橋接型社會資本及連結型社會資本，歸納出兩者之間可能的關係。

在結合型社會資本上，主要著重於家人、親友或鄰居對幸福感可能的影響，包括：(1) 與家人、親友和鄰居的關係，會影響個人身心福祉與健康；(2) 與家人居住狀況與關係緊密度，會影響工作與生活的平衡；(3) 與家人和鄰居之間的緊密關係，對個人的經濟生活影響不一；(4) 鄰居之間的緊密互動，有助於降低人身與居住安全的風險。

在橋接型社會資本上，主要強調部落／教會的參與、歸屬感與凝聚度對幸福感可能的影響，包括：(1) 與部落／教會關係佳，正向互動，可提升個人心理福祉；(2) 部落參與越多，互助意願越高，有助於提升個人的經濟生活；(3) 部落／社區網絡可提升人身與居住安全；(4) 部落族人擁有歸屬感、摒棄私心、建立信任，有益於部落／社區治理；(5) 部落族人凝聚度越高，更有助於推動符合族人需求的公共事務。

在連結型社會資本與幸福感上，主要著重於與部落外組織或政府部門的連結，對幸福感可能的影響，包括：(1) 與部落外的政府部門和非營利組織的連結，有助於身心福祉的維護；(2) 缺乏對外部組織的信任與互惠，不利於部落就業或福祉方案的推動；(3) 與部落外的公私組織連結，有助於舒緩



經濟壓力，但難以有效解決；以及(4)與部落外的互動雖有益於部落的成長，但亦有其負面效應。

五、討論與建議

基於本研究之研究發現，底下將從社會資本的視角，討論並提出有助於原住民幸福感的相關建議。

(一) 以漣漪效應累積社會資本存量，作為創造與維繫幸福感的後盾

本研究發現，社會資本的各類型與各要素間，絕大多數有顯著的相關，且無論是結合型、橋接型或連結型社會資本，皆是預測原住民族整體幸福感的顯著因子。為此，政策上宜規劃適當的機制，以強化「結合」、「橋接」或「連結」等三類型的社會資本，藉由其產生的「漣漪效應」，創造並累積更多的社會資本，進而為促進原住民族的幸福帶來更豐富的潛在能量。誠如 Giddens (2000) 所指，猶如財務資本能更用於投資般，社會資本可被擴張——投資和再投資，以產生擴散式的乘數作用，進而為解決原住民的相對不利情境，創造更豐沛的資產。

(二) 尊重原住民族對幸福感的詮釋，並視之為改善其不利處境的優勢能量

本研究發現，原住民的快樂分數相當正向，這項發現打破了社會在不知不覺中建構出原住民似乎很不快樂或很悲情的感覺(孫大川，2000)。若原住民主觀認知自己並非不快樂或不幸福，社會大眾應予以尊重，**甚至可視之為是一項原住民的優勢**，並在政策的擬訂上依其優勢進行設計，這不僅可降低社會在不知不覺中加諸於原住民壓迫或歧視，並可提供給原住民族改善其不利情境之積極與公平的機會。

(三) 善用正式支持體系維繫非正式支持體系，以協助原住民族創造更多的幸福感

本研究發現，社會資本對原住民整體及多面向的幸福感受顯著的影響，且原住民社群之結合型社會資本仍是相當濃厚的。在一個傳統家庭照顧或鄰里互助的價值與功能正蒙受巨大挑戰時，濃厚的結合型社會資本是一項原住民族寶貴的資產。為維繫甚至強化這項資產，在原住民族社會政策的設計上，宜以正式支持體系協助並強化非正式支持體系，並致力於發展正式支持與非正式支持之間的夥伴關係與合作策略，以為原住民族創造更多的幸福感。

(四) 重視經濟條件對社會資本的影響，且是創造原住民族幸福感不可或缺的要件

儘管幸福並不全然取決於經濟福祉，但基本的收入或所得卻是生活福祉的基礎。本研究發現，無論是社會資本或幸福感的各個面向，經濟所得較佳者皆顯著優於狀況較差者。原住民族的經濟狀況普遍不佳是事實，且與主流社會有一定程度的落差，若未能獲得合理的改善，幸福只會是一種難以實現的想望或奢望。為此，我們除強調社會資本對幸福感有重要影響外，相關政策的規劃亦應致力於為原鄉社會創造一個公平的經濟生活機會，以為原住民族的社會資本的維繫與幸福感的追求奠定必要的基礎。

另外，幸福感往往是由比較而來的，本研究僅以原住民為對象進行調查與研究，並不知道原住民族與主流社會或其他族群的差異，讓研究結果缺乏比較的基礎。建議未來的研究可將社會各個族群納入調查，以透過比較來呈現不同族群之幸福感的全貌。

參考文獻

- 原住民族委員會 (2015a)。《103 年臺灣原住民族就業狀況調查》，新北市：原住民族委員會編印。
- 原住民族委員會 (2015b)。《103 年臺灣原住民族經濟狀況調查》，新北市：原住民族委員會編印。
- 孫大川 (2000)。《夾縫中的族群建構》，臺北：聯合文學。
- 陸洛 (1998)。〈中國人幸福感之內涵、測量及相關因素探討〉，《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彙刊：人文及社會科學》，第 8 卷第 1 期，頁 115-137。
- 黃源協 (2014)。《原住民族社會福利——問題分析與體系建構》，臺北：雙葉書廊
- 鄭麗珍、李明政 (2010)。〈臺灣原住民族社會福利與健康政策評估〉，收錄於黃樹民、章英華主編《臺灣原住民政變遷與社會發展》，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頁 181-258。
- Durkheim, E. (1951). *Suicide*, New York, NY: Free Press.
- Giddens, A. (2000). *The Third Way and Its Critic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Gittel, R. & Vidal, A. (1998). *Community Organizing: Building Social Capital as a Development Strategy*, California: Sage.
- Granovetter, M. (1973).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 (6), 1360-1380.
- Halpern, D. (2005). *Social Capital*. Cambridge: Policy Press.
- Helliwell, J., Layard, R. & Sachs, J. (2012). *World Happiness Report*, The Earth Institute, Columbia University.
- Johnston, G. & Percy-Smith, J. (2003). "In search of social capital". *Policy and Politics*, 31 (3), 321-34.
- Kearns, A. (2003). "Social Capital, regeneration and urban policy". In M. Raco & R. Imrie (Eds), *Urban Renaissance? New Labour, Community and Urban Policy* 37-60. Bristol: Policy Press.



- Middleton, A., Murie, A. & Groves, R. (2005). "Social Capital and Neighbourhoods that Work". *Urban Studies*, 42 (10), 1711-1738.
- Newman, L. & Dale, A. (2005). "The Role of Agency in Sustainable Local Community Development". *Local Environment*, 10 (5), 477-486.
- Talbot, L. & Walker, R. (2007). "Community perspectives on impact of policy change on linking social capital in a rural community". *Health and Place*, 13, 482-492.
- Thin, N. (2012). *Social Happiness: Theory into policy and practice*, Bristol: Policy Press.
- Thoits, P. A. (1982). "Conceptual, method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problems in studying social support as a buffer against life stress".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145-159.
- Woolcock, M. (2001). "The Place of Social Capital in Understanding Social and Economic Outcome".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cy Research*, 2 (1), 11-17.